海外僑胞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下）

屠海鳴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副會長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　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　港區上海市政協常委

（接前文）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需要近14億中國人共同努力，也需要和諧、穩定、友好的外部環境。幾千萬海外僑胞，遍佈世界五大洲、百餘個國家，在各個領域都不乏佼佼者；在一些國家、一些領域甚至舉足輕重，這是一支非常可貴的重要力量。在民族復興大業中，海外僑胞完全可以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筆者認為，海外僑胞至少可以發揮好四個作用。

當好中華文化的傳播者。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興則國運興，文化強則民族強」。

中華文明是迄今唯一沒有斷流的文明。這說明什麼？說明中華文化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文化，它有兼容並蓄、海納百川的特性。「和為貴」、「君子和而不同」、「家和萬事興」、「和氣生財」、「協和萬邦」，「和」文化綿延數千年，形成了異乎尋常的凝聚力、吸引力、向心力，這是中華文明不斷流的「密碼」。家庭和睦，社會和諧，國際和平，是中國追求的目標。今天，有些國家對於中國的崛起心存疑慮，擔心中國崛起會搶奪他們的「奶酪」。海外僑胞應該準確把握「和」文化的精髓，廣泛傳播中國的「和」文化。

當好「中國故事」的講述者。改革開放近四十年來，在西方預言家「中國崩潰論」與「中國威脅論」的輪番轟炸中，中國經濟一路攀升、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中國故事」持續演繹精彩。「中國為什麼能？」「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十九大後的首個主場外交活動是中共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全世界近300個政黨和政治組織的600多人齊聚北京，探尋中國共產黨成功帶領中國走向強盛的「密碼」。其實，這個「密碼」就是我們選擇了適合中國的道路、理論、制度、文化。十九大報告指出：「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海外僑胞應該準確認識中國崛起的深層次原因，講好「中國故事」。

民族復興，海外僑胞的重要作用

當好「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助推者。作為一個越來越接近世界舞台中心的大國，「建設一個什麼樣的世界？」「怎樣建設這個世界？」中國方案是什麼？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堅持和平發展道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十九大報告還有諸多金句。比如：「沒有哪個國家能夠獨自應對人類面臨的各種挑戰，也沒有哪個國家能夠退回到自我封閉的孤島」「走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的國與國交往新路」「以對話解決爭端、以協商化解分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衝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這些都集中體現了「中國主張」。海外僑胞應該認真領會「中國主張」的深刻內涵，當好「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助推者。

當好「全面開放新格局」的聯絡者。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要以『一帶一路』建設為重點，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並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加強創新能力開放合作，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格局。」如果說以往中國開放的重點是「引進來」，那麼，現在步入了「引進來」和「走出去」雙向並重的新開放時代。海外僑胞熟悉在駐國風土人情、經濟運作體系、國際貿易規則等，完全可以發揮好聯絡的作用，為中國「走出去」助一臂之力。

民族復興，我輩有責。致力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包括港澳同胞與海外僑胞永遠在路上！　（全文完）

補選部署各懷鬼胎「寧贈友邦不予家奴」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反對派即將就新界東及九龍西進行初選。所謂初選，實際就是反對派內誰也不服誰，沒有一個眾望所歸的參選人，於是才要勞民傷財地設立一個初選機制，讓各黨派在初選後可以乖乖地團結一起支持勝選人士。初選的出現，正正是由於反對派的不團結、各懷鬼胎所造成。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下出現的初選機制，並不可能產生出各黨派心服口服的人士。始終，反對派內部是競爭關係，自己不能出選，斷沒有資助競爭對手出選之理，所以反對派的初選注定是充滿矛盾和計算。

日前，新界東三名反對派有意參選人，包括新任工黨主席郭永健、新民主同盟范國威和中大學生會前會長張秀賢分別會見民主黨的中委，爭取民主黨支持。民主黨中委在會面後隨即進行表決，最終以大比數通過在初選階段支持工黨郭永健。民主黨決定押注郭永健，但他不過是李卓人的一名職員，一直名不見經傳，如果不是工黨在上屆立法會大敗，及後主席胡穗珊又因為與何秀蘭權鬥失敗而退黨，怎可能有機會成為一黨之首？論知名度、論政治實力，郭永健都不是范國威對手，民主黨的決定顯然是出於政治考慮。

范國威與民主黨的恩怨一本書也寫不完，民主黨中委的決定當然是出於私怨，不希望將自己資源資助叛徒。但更重要的是，民主黨一直希望重奪新東兩席，新民主同盟雖然在上屆遭受重創，但地區實力仍在，如果幫助范國威重返議會，新東維持現有的政治格局，民主黨怎樣取兩席？相反，支持郭永健，一方面就算最終范國威贏得初選，民主黨也可以支持郭永健為由在助選中放軟手腳，另一方面如郭永健勝出初選，最終在補選中不論勝負，以他及工黨的實力，也威脅不到民主黨，這樣的交易十分划算，既顧及民主黨的愛恨，又可撈取最大的政治利益。

反對派補選部署志在「卡位」

同樣情況亦出現在九龍西。馮檢基在政壇混跡多年，與民主黨、公民黨一直有合作，雖然不可說是推心置腹，但也是「密切戰友」。但當馮檢基擺明要出選之後，公民黨、民主黨卻反應冷淡，兩黨甚至推出黨內新人卡位，也拒絕支持馮檢基。近日最新情況是姚松炎決定參選九西，立即得到多數反對派政黨政客的支持，儼然成為眾望所歸的人選，反而馮檢基卻不斷被人勸退，教基哥情何以堪？

為什麼姚松炎參選前呼後擁，馮檢基參選卻被頻頻潑冷水，是能力、是聲望、是勝算嗎？都不是，原因就是寧贈友邦不予家奴。九西是民協大本營，沒有一個立法會議員說不過去，但馮之得就是反對派之失。馮檢基敗部復活，等於現有的反對派議員必有一人要「犧牲」，請問誰會這麼笨？而姚松炎只是過客，加上與其他反對派政黨在九西沒有利益衝突，自然得到他們的大力擁護，相反馮檢基卻是斯人獨憔悴。

反對派在補選的部署，與其說是爭位，不如說是「卡位」，由於各大黨並不涉及這次DQ案件，議席爭不爭得到與他們無關，但如果因為協助他黨爭奪議席，而中門大開，將自己的政治資源、地區樁腳白白送給對手，卻是得不償失。因此，他們的補選策略就是要卡住所有競爭者，不讓他們參選，自然就不會真心支持范國威、馮檢基。這就是政治，並非什麼初選機制可以改變得了。

為香港福祉而戰　堅決遏止拉布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

立法會審議修改議事規則之戰上周開打。一如所料，反對派不遵守議事規則，圍堵主席台，阻礙會議進行，導致立法會被迫休會。修改議事規則之戰要打多久、能不能打贏，所有建制派議員要有信心、決心和耐心，全港市民更要團結一心，全力支持建制派議員打贏這場關係全港市民福祉的硬仗。

首先，立法會主席要堅持原則、敢於碰硬，要採取遏止措施，維護會議正常有序進行，主席應行使基本法及議事規則賦予的「決定議程」權力，果斷採取必要措施，包括嚴格管控議員在議會的言行，對於任何暴力阻撓會議進行的行為，依法驅離及提出檢控；要調整會議議程，加開會議，確保議案能及時通過。

反對派黔驢技窮，不惜以暴力衝擊議會，危及立法會保安人身安全，涉嫌觸犯《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屬刑事罪行。《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規定，任何人在立法會會議中引起擾亂致會議中斷，即屬違法，可處罰款一萬元及監禁12個月。就反對派包圍主席台、阻撓他人發言的行為而言，主席完全可以指示秘書處報警處理。

反對派立法會召集人莫乃光透露，從昨日傍晚會發起在立法會外紮營留守包圍行動，反對修改議事規則。反對派的行徑，企圖將台灣的「爛仔議會文化」搬到香港。未來反對派議員可能會衝上主席台搶咪，甚至霸佔主席座位，逼主席宣佈休會，以達到他們阻延審議修改議事規則的目的。

企圖掀起另一次違法「佔中」

反對派或許會在包圍立法會的同時玩絕食抗議，阻撓議員入場議事，企圖掀起另一次違法「佔中」，向建制派議員施壓。因此，警方與政府有責任維持立法會外的秩序，確保立法會大會順利進行。

近年來，反對派拉布對香港所造成的傷害，已到了罄竹難書的地步，令政府施政舉步維艱，拖垮香港發展。據立法會秘書處資料顯示，2012至2016年的第五屆立法會，會議時數長達2,174小時，當中議員要求點算法定人數高達1,478次，消耗逾220小時；因為法定人數不足而休會也有18次。除了每年必拉的財政預算案之外，高鐵撥款、醫委會改革、版權修訂等諸多議題，無關政治的民生政策都成為反對派拉布對象。

最近有大學民調顯示，受訪市民中反對拉布的多達6至7成。反對派日前舉行反修改議事規則的集會，也只有200人參與，可見無良政棍失道寡助。要堵塞拉布漏洞，讓議事堂重回正軌，治本之道始終是修改議事規則。

反對派拉布變本加厲，如今玩拖字訣，希望明年補選重奪「關鍵少數」，可以繼續拉布。反對派曾氣急敗壞驅趕記者出議事廳，亦足以證明已到了黔驢技窮的地步，也說明修改議事規則威力巨大。全港市民、全體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團結一心，打贏這場關係香港前途的硬仗，令議會重回正軌，使香港步上繁榮穩定的發展之路。

自薦計劃反應佳顯青年關心社會

顏汶羽　青年民建聯主席

筆者對於有過千名青年參與自薦計劃感到非常鼓舞，香港青年人越來越關心我們自己的社會，敢於承擔、願意發聲、走入體制，是為自己未來的家園盡力的表現。青年是香港的未來，「青年興則國家興，青年強則國家強，青年有希望，未來的發展就有希望。」

政府於今年引入自薦制度，讓有意加入政府諮詢委員會的青年可以自行報名，經過遴選後，加入委員會，直接向政府表達青年意見。這種做法一改以往的單向物色委員的做法，變成雙向的招募委員方式。這種做法令青年人有所參與，最終能否獲選也要視乎該青年的長處是否適合該委員會的要求了。

今次政府率先在5個委員會中，透過自薦制度來招募11個青年委員，結果有過千名青年報名申請。這千多名青年都是願意走入體制，對社會事務都是有看法、有承擔、有熱誠、肯奉獻的。政府應好好善用這批青年人，他們都是香港的未來，也是意見的領袖。雖然今次只有11個名額，但這個人才庫是政府要多加善用的。

筆者建議政府在5個委員會下增設不同的小組，增加更多的議政論政平台，讓這千多名青年人可以各展所長、有所發揮。同時，今次自薦計劃的反應甚佳，政府也應加快步伐，將自薦計劃擴展至更多的諮詢委員會及更多年齡層，讓更多香港市民能夠參與其中。全面廣泛的諮詢是有利政府日後的施政，更多市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定，公共政策的完整性定必增強，政策落實時阻力亦會相對較小，是有利而無害的舉動。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須法治先行

丁　煌　執業大律師　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副主席　城市智庫「就是敢言」計劃成員

年初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發揮港澳獨特優勢，推動內地與港澳深化合作，研製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7月1日，在國家主席習近平見證下，粵港澳三地政府已正式簽署了《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為粵港澳大灣區確定明確的發展方向和目標。

謀求粵港澳大灣區長期發展須法治先行。換言之，區域法治化是區域成功治理必然要求。所謂的區域法治化是在特定區域範圍內制定規範性法律。一方面，法治可確保區域內各合作方公平競爭；另一方面，法治能完善產權制度，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最終促使區域規劃得以有效實施，達成目標。

早在2011年，時任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的杜鷹，在一個有關區域合作座談會上指出，國家區域政策體系不健全，區域治理方式和管理制度不完善，區域立法更是空白。然而，在過去短短的6年間，已有22份有關粵港澳大灣區的報告陸續出台。3月兩會期間，廣東省發改委主任何寧卡建議，未來將仍從基礎建設、產業創新、共用產業價值鏈、構建「一帶一路」、共建金融核心圈以及優質生活圈6個方面重點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可見，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已「上馬」。

然而，粵港澳大灣區內11個城市法治程度存有不少差異。首先是政治制度上的差異，9個內地城市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制度，而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實行的是資本主義制度。然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承認私有產權。此外，在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制度下，當市場失效時，政府干預的必要性得到廣泛的認同。接着是法律體系上的差異，不可否認，在實務運作過程中，立法權、司法權、執法權行使上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雖然如此，以「利國利民」為發展核心，任何問題皆有解決的方法。最後是法律制度上的差異，包括民商事和經濟管理等方面。

專家倡三地共同制定經貿合作條例

有見及此，華南理工大學鄭方輝和邱佛梅博士建議三地政府共同制定《粵港澳大灣區經貿合作條例》，包括完善優良的法規體系、廉潔透明的法治政府、公正的司法系統、有效的市場監管機制、自由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健全的商事糾紛解決管道等。本人甚為同意，實現粵港澳大灣區法治融合才能推動區域協同發展。但是，大灣區法治融合這一宏偉的目標又該如何具體實現呢？我想，大體上可以通過正式和非正式兩種方式具體落實。可以說，推動大灣區的發展既有利於加強廣東與港澳經濟合作與融合，也是「一國兩制」具體實踐的平台。

其中，以正式的方式落實大灣區區域法治目標之可行方案又可一分為二。也就是說，在大灣區法律基礎建設的最初階段，中央政府可以採用以下的兩種方法推展。其一，在中央政府的帶領下，將區內11個城市既有的相關法規進行大融合，從中找出可行共融的方案。此乃「兩制」互為融合的具體實踐。其二，由中央自上而下地為大灣區立法，而區內11個城市則依法辦事。我們不難看出，由中央直接立法要比融匯既有法規來得快捷及有效率。

至於非正式的方式，乃以企業發展為主導。大灣區發展過程中，參與其中的各大企業最關心的莫過於利益分配。在各經濟領域中，區內11個城市以合夥形式互相合作。當利益得以公平分配時，自然可以減少糾紛，促成合作並推動進一步的發展。因此，中央應預先劃定可授於企業的權力之範圍，而相關監管機制亦需同時啟動。

我想，粵港澳大灣區可以說是「法治中國」的一個實驗地，「一國兩制」的融合點，更是香港再發展的嶄新平台。循序漸進地打造這個世界第四大灣區是國人共同的期盼。

零停滯的創科世界

梁穎宇　創業投資者聯盟召集人

全球爭分奪秒，搶攻創新科技市場。在最近一個科技會議之上，向來依賴產油業的沙特阿拉伯，其王儲穆罕默德都表示，現時98%車輛使用汽油，25年後，只餘50%使用；50年後汽油運行的交通工具將絕跡。沙特已投入千億美元到軟銀願景基金以進入科技市場，並認可智能機械人Sophia成為第一位沙特公民。創科浪潮已席捲全球，連科技發展不發達的國家或地區都要趕上，香港身處同樣的競賽中，實有必要急起直追。

創科世界並沒有停頓的時刻，要走到尖端，杭州是好值得香港參考的地方。相比北京、深圳和上海，杭州發展創新科技相對遲，但增長的速度卻遠超其他內地的城市。

杭州經驗值借鏡

本以旅遊業為主的杭州，在2016年的GDP比上年增長9.5%，在全國經濟下行下，仍錄得超高速增長，全賴積極推動創科發展。杭州在A股上市的公司數量是115，比早已發展創科行業廣州的93，多近兩成，又有世界知名的阿里巴巴在杭州設立總部，帶動當地的創科業起飛，令人才流入率在今年達11.21%，以雙位數字增長，大幅拋離只有1.42%的廣州。

究其原因，是杭州重點給予有成績的創科公司支持，例如項目達到國內首創或國際同類產品先進水準，便可獲實際設備技術投資額10%-50%的獎勵，累計最高可達1-2億元人民幣；對完成臨床試驗和獲得註冊證的企業、對投入研發比重高的企業、對被認定為國家級或省級企業研發中心，都給予獎勵。

華大基因的研發主管也指出，深圳正積極孕育更多初創企業，只要是在美國最頂尖50家大學畢業的博士生，每人可獲100萬人民幣創業。這些可能是極端進取的政策，但要知道，內地的城市都正在互相競逐，爭取人才、初創企業及創投資金。

香港的初創企業超過2,000家，有足夠的數量推動行業發展，如何把現有的香港創科公司做大做強，「由小孩子成長為青年」，可能是政府要處理的任務之一。政府可考慮向取得顯著成果的公司，提供財政上的鼓勵。正如借鏡杭州的經驗，如研發獲國家或省級認可、或達到臨床驗證等階段，便可以撥款支持；教資會檢討研究政策及資助專責小組也可以考慮撥款支持獲認可成果的研發。

除了資金之外，也要協助初創企業走出香港。2年前，浙江省政府便選定9家醫藥科技初創企業，在無償條件下，於3年間，向每家公司撥出1億元人民幣，一旦他們獲得國家藥監局認可，便會納入浙江省醫保目錄產品，促進銷售。地方政府不但獲得有關的醫藥產品，而且該產品可以獲得醫療報銷。

我們曾目睹一些獲國家藥監局認可的醫藥公司推出相關新產品之後，單在浙江省，3年內銷售量飆升到5億元人民幣。這不單助有關公司大規模生產達到更高的經濟效益，並且提升他們的營運及製造能力，以窺準內地其他地區及世界的市場。

香港有望迎頭趕上

內地藥企加強藥物研發得到國策配合支持，國家藥監局對創新藥審批設「綠色通道」，縮短審批時間，加快創新藥上市銷售。若成功獲納入醫保目錄產品，銷售可以達10億人民幣。部分藥企更透過海外併購或授權，獲得專利，增加研發，打入海外市場。

杭州可以從旅遊業，透過政府的支援和政策轉型，在創新科技領域上急起直追，媲美已發展一段時間的廣州，以香港的優厚條件，只要有明確的目標，絕對有望迎頭趕上。